不同的“轰动”：商业运作视角下

副刊与小报连载小说创作差异比较

——以《啼笑因缘》和《亭子间嫂嫂》为中心

石 娟

现代传媒是现代文学赖以存在的物质载体。报纸和期刊诞生之后，直接导致了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从形式到内涵之间的差异，对长篇小说而言影响尤为深远。蒲松龄撰《聊斋志异》，动机是“雅爱搜神”，“闲则命笔”，“储蓄收罗久矣”，“年五十始写定”；[1]曹雪芹写作《红楼梦》，“于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2]，“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而自报纸、期刊出现之后，小说一转而变为连载，“朝甫脱稿，夕即排印，十日之内，遍天下矣”[3]，作者在写作时难有古人那种“优游删润，以求尽美尽善”[4]的从容态度，转而成为“文字劳工”，急于“广声誉，得润资”。对于这种情况，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在《<新小说>第一号》中忧心忡忡地提出了当世小说创作的“五难”[5]，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小说品质的担忧：

一部小说数十回，其全体结构，首尾相应，煞费苦心，故前此作者，往往几经易稿，始得一称意之作。今依报章体例，月出一回，无从颠倒损益，艰于出色。[6]

同时，梁启超还指出，报刊连载小说的时效性对长篇小说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古代长篇小说“最为精彩者，亦不过十数回，其余虽稍间以懈笔，读者亦无暇苛责”，而连载小说“按月续出，虽一回不能苛简，稍有弱点，即全书皆为减色”；古代长篇小说由于顾及结构的完整，常常先抑后扬，“篇首数回，每用淡笔晦笔，为下文作势”，而报刊连载小说出于分段阅读的需要，“不得不于发端处，刻意求工”，使其载体成为“单日畅销书”[7]，从而盈利。应该说，梁启超世纪初即已经关注到以报纸为代表的现代传播载体出现以后现代长篇小说与古代长篇小说的本质差异，他所忧虑的由于载体和创作行为改变而带来的小说质量下降的问题，一直贯穿于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始终，成为现代文学活动从创作到接受整个过程中最具有普遍性也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由于寄生于报刊之上而必须面向市场的现代长篇小说究竟该如何克服载体的限制而呈现生机，如何在载体、市场与文学审美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或者说挣脱载体之“累”而赢得现代长篇小说对于文学本质的追求和灵魂的回归，这不仅是印刷资本诞生之后出版者（主笔、主编）与创作者一直努力破解的“达芬奇密码”，更是20世纪文学研究界有待持续关注的学术生长点。在民国时期所有的印刷媒介中，报纸的时效性更强，周期最短，相对于期刊而言，报纸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更为突出。而报纸与长篇小说之间，又有一种无法撇清的共存关系[8]，因此，报刊连载小说这一非常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文本形态，为我们进入这一领域的思考提供了一种可能。

一

很多研究者在面对通俗小说文本时，常常是以单行本为参照予以分析，这里面就忽略了近现代通俗小说因了现代传媒而具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式特点——连载。如果分析近现代通俗小说的一系列问题，必须进入连载形式本身对小说结构予以思考，“连载”，是近现代长篇通俗小说非常重要的文体特征，它直接影响到了小说的文本结构方式。长篇小说在连载的过程中，创作不再是作家个人密不透风的行为，它因了媒体的参与而具有了开放性，同时媒体的差异又直接为长篇通俗小说的走向提供了多重可能。通俗文学的长篇小说，通常是连载于各类文艺期刊、大报副刊和小报上，如果在连载过程中作品非常受欢迎，就会有出版商考虑将作品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一般来说，文艺期刊的出版周期要比报纸长得多，同时，又由于期刊每期上面留给长篇小说的版面较多，而报纸由于版面限制，一部小说每天只能连载几百字，所以，单从外观上看，期刊上的连载小说与报纸连载小说即有很大不同，这是由于载体差异带给小说的差异。但大报和小报都属于报纸，除了大报对开版面，且版面众多，[9]而小报一般只有四开大小，且一般只有四版[10]这样一种形式差异外，二者每天连载的小说从外观上看具有非常大的相似性，比如每天均连载几百字，连载的时间都比较长，作家创作体验常常支离破碎[11]……然而，梳理并跟踪它的文本生产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大报副刊连载小说与小报连载小说相比，从形态及结果上看，有非常大的差异。与小报连载小说“未完成时态”特点[12]对比而言，大报连载小说常常呈现出“完成时态”[13]。也就是说，相对于小报连载小说，大报副刊刊载的长篇小说连载结束之后刊行单行本的作品数量比例较高。《新闻报》副刊《快活林》和后来的《新园林》上连载过的李涵秋的《侠凤奇缘》、《镜中人影》、《战地莺花录》，向恺然的《玉玦金环录》、《留东新史》，顾明道的《荒江女侠》、《荒江女侠续集》，张恨水连载于《新闻报》的几乎全部的小说如《啼笑因缘》、《太平花》、《现代青年》、《夜深沉》、《满江红》、《纸醉金迷》等作品，在连载结束后都很快即出版了单行本。以20世纪30年代的印刷水平而言，《啼笑因缘》在《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上1930年11月30日连载结束，一个月之后，1931年1月11日即由三友书社出版了单行本。这样的出版速度在信息化的今天也是令人瞠目的。相较而言，小报连载小说单行本出版率要低得多，这里面固然受小报连载小说数量多、基数大的影响，但从载体层面分析，更重要的原因莫过于大报副刊具有充足的条件，如人力、资本、时间、稿源、发行渠道及发行量等，可以对于连载于其上的小说进行充分的商业运作。

与小报比起来，大报的资本可谓非常雄厚。周天籁曾描述过小报编辑部的情况：

主办的人须有才学，又能干，可以吸引一部分读者。自己拉稿，自编自写，手下只用一个助手、一个校对、一个茶房，广告又有把握拉拢，白报纸可以打个保单给纸头行家做帐，否则每天用多少买多少，买半令、买一令都可以，印刷又可以先付一半，还有一半到月底再结，或者五天一结，都可以。编辑部设在一个亭子间内，自己家里不怕小囝烦，更加好。一张写字台足够派用场。助手的薪水，打他三十只老羊；一个校对，打他十五只老羊；一个茶房，打他十只老羊。[14]

相对于小报编辑部的简陋与寒酸，大报可谓“财大气粗”。1908年，新闻报馆在“汉口路买基地一方，新建四层楼房一幢。1909年从山东路单开间门面迁至新屋办公，全馆职工由数十人增至二百余人”，福开森“向美国购得二层卷筒机一部，每小时可印报七千份”。为保证报纸来源，汪汉溪向通商银行贷款，“将报馆地基、房屋、机器固定资产及纸张、油墨等物料、生财、动产，全部抵押”，一下子就购进了六年的存货。[15]而且在1924年之前也就是创刊30年之后就全部还清了债务。报馆内除编辑部之外，在1923年，还设置了发行部、广告部、制版部、铸字部、铜牌部等部门，功能齐备，分工明确。大报的资本之雄厚，小报是望尘莫及的。再加上小报版面只是大报版面的一半，每天一般只有四版，其生存几乎全部依靠报纸的发行量，因此，一旦纸张价格有了风吹草动，就会直接影响报纸定价。《东方日报》曾刊出《本报增加售价二分启事》，解释报纸售价增长原因为“欧战影响，白报纸价格飞涨，较前超过五倍以上，以致亏蚀颇巨。”“经全沪小型报同业公议，议决自本日起每份售价，暂增二分”[16]。而大报在售价上则少有这样的敏感。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闻报》，每份报纸定价是三分六厘，除去报贩的利润，报馆实际上每份只得不足一分八厘。再扣去邮局的运输费，《新闻报》每销出一份，每份报纸要亏本二分左右。[17]而《新闻报》发行量最高之时，销数达到15万份。这样算来，如果像小报那样完全依靠发行量，那么发行越多，亏损也越大，《新闻报》岂不是一天也生存不下去？其实不然。与小报不同，大报的利润主要来源于广告。为了登载更多的广告，大报常常想办法增加版面。在《新闻报》上，“以日出五大张计算，广告所占版面约为三大张”[18]，占到报纸全部版面的60％。而广告价格又因位置不同而分为四等：

特等：新闻栏中计四十字为一行，三行起码，每日每行九角；一等：报名旁上封面一小版，每日每版洋二百六十元，自下封面起至评前止，计八十字为一行，二行起码，每日每行一元八角；二等：紧要分类每行二十字高为限，至少四行，至多一百行，每行每日三角；三等：本埠副刊分类，计二十字为一行，四行起码，每日每行二角。[19]

这一笔巨大的利润，使得《新闻报》在广告上面投注了巨大的热情。不仅给予广告公司以二成的回佣[20]，而且想尽办法增加版面，逢到节假日，几乎一个多月之间就会早早就刊出节日广告刊例，待到节日当天，版面便大量增加，甚至多至一天增加十版，与副刊的节日特刊一起，和广告混合着撑满篇幅，而报纸并不加价。[21]所以，《新闻报》增加发行量的真正目的在于吸引商家在报纸上做广告，以广告收入来弥补发行上的亏损。发行量越高，报纸的广告收益就越高，报馆效益就越好。

小报则没有这样的版面优势与资本基础。由于发行量决定了小报生存与否，所以，小报上刊载的内容能否受到读者欢迎就显得至关重要。又由于连载小说具有的商业价值，小报非常重视。[22]为了满足读者不同的阅读口味，争取更多的读者，很多小报都尽可能多地刊登连载小说，甚至一天同时刊载几部小说[23]。这就决定了小报对于小说的需求非常迫切，而“小报稿费素来菲薄，大都朋友帮忙性质，主办人常常请请客、喝喝老酒，也有不计稿费的。”“稿费打他一块钱一千字，已经算了不起了。”[24]由于这些原因，很多小报编辑在择选稿件的时候常常慌不择路，小说的仓促构思以及质量粗糙便很难避免了。

相对于小报在长篇小说择选上的“仓促应战”，大报则显得沉稳许多。长篇小说也是《新闻报》增加发行量的法宝之一[25]，由于直接牵涉到经济利益，所以，在副刊上登载的小说，上至报馆老板，下至副刊主编、编辑都非常重视。与小报比较而言，大报无论在资金还是稿源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新闻报》不仅对选入其中的小说都严格按字数支付稿费[26]，又由于可选择余地较大，对于小说的甄选也较为严格。由于稿源较多，主编对于来稿刻意“挑三拣四”，对于一些好作品，也只好忍痛割爱。严独鹤就曾专门向小说投稿者道歉：“乃有明明佳作，而或为篇幅所限（如长篇小说投稿者常有佳构，然快活林中既载涵秋之作，限于篇幅，后来者遂不得不婉辞谢绝……）”[27]，而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尽管于1929年5月前后即已约稿，稿子11月张恨水寄给报社后即拿到了部分稿费，却也因为顾明道的《荒江女侠》未连载完而搁置了五个月之久，也就是1930年3月17日才与上海的读者见面[28]。在这种情况下，报社主笔不仅可以对即将发表的小说提出自己的意见，而且也可以对小说连载的形式予以精心策划，并在小说连载之前，就为其宣传造势。这一切条件，小报都难以企及。

二

《啼笑因缘》和《亭子间嫂嫂》分别是连载于20世纪30年代《新闻报》副刊《快活林》和《东方日报》的两部社会小说，连载之时，都取得了空前的轰动。对它们连载过程予以比较，即可看出这两种“轰动”产生的原因及结果完全不同。

首先是两部作品构思所花费的心思不同。1929年5月14日，上海日报公会新闻记者东北视察团一行二十余人，从上海出发，考察易帜之后的新东北，归来直达北平。5月26日，由北平新闻界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设宴款待。经钱芥尘介绍，严独鹤与张恨水相识，并口头约定张恨水为《快活林》写一部以小市民和小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具有北方风味的小说，并特别强调给南方的读者创作的文字，一定要有“噱头”。于是，在构思布局这部小说的时候，张恨水反复推敲：这个故事，既不能太隐晦，又不能太明显，同时，既不能太抽象，又不能太具体。要雅俗共赏，骚人墨客不讨厌它，而不识字的老太太也可以听得懂，叫得上来。11月前后，张恨水将初稿寄给严独鹤，严独鹤又特意致信张恨水，“再三”的请他写两位侠客，恰是由于此时上海洋场对章回小说“肉感”和“武侠而神怪”的要求。于是，《啼笑因缘》中出现了沈凤喜、何丽娜、关秀姑与樊家树的四角恋，又出现了功夫了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关寿峰。就在小说开始连载的前一天，也就是1930年3月16日，严独鹤又在《快活林》“谈话”栏目隆重推出《啼笑因缘》，开始便对《啼笑因缘》大力推介。[29]可见，《啼笑因缘》的诞生，是经过的非常充分的准备与策划的。

与严独鹤和张恨水的苦心经营恰成对照，《亭子间嫂嫂》的诞生却是在《东方日报》的编者软硬兼施之下，周天籁偶然想到的。周天籁后来曾回忆这段经历：

当初本报主人托徐大风先生来同我商量时候，那还是民国念八年的春天，细雨濛濛的一个下午，正像这几天乍晴乍晦的气候，徐先生是一常相熟的。这一天他挟了一柄雨伞，手上提了一大包书。笑嘻嘻的跑来，说是有一点事情托我，问我近来书局里的工作忙不忙。我便问他有何事情见教，先生冒雨而来，就是很忙也要替你办到。他就谈起要我替本报担任一部中篇小说，约四五万字，预备二个月结束，并且要我立刻交给他一个题目，预备制锌版。当时我真有点难以答复，因为有几点困难。一，在下是研究儿童文艺的，可说社会小说没有把握，只怕轻易尝试，写不好。二，那时候手边已有三四种特约的书，都是限月限日交卷，如果再接手另外稿子，势必又要耽搁特约的书。三，要立时立刻交题目，按理先有题材而后才有题目，现在急急忙忙的题材根本谈不到，试问这题目何从拟起。当时便告诉徐先生，可否容我一二天的斟酌，或可遵命。但徐先生坐定不开船，而且这一天记得是三月念（廿）九，说是四月一日就要开始刊登我的小说，事情不能不说匆促。在徐先生感情之下我只得勉力答应了下来。于是我胡乱拟了几个题目，以便斟酌，他看看都说不能用。不知如何我脑子里忽然横里飞来一个印象，便是我那一年租住在会乐里时候，隔壁亭子间里有个私娼叫顾秀珍的，人极精彩，我们都喊她亭子间嫂嫂，她的一段往事我始终印在脑子里，二年以来未曾减忘，如果将她一生事迹写了出来，的确是一部上海社会小说，而且并不是人人都知道的，可说属于另一层阶级的人物。因为我同她做过有二年以上的邻舍，结果她是那样的惨死，我偶一记忆，依然活跃在我眼帘之前……当时我便随意写出“亭子间嫂嫂”五个字交给徐先生，想不到他大为赞成，第二天本报主人就把它刊出预告来了。[30]

或许时隔近两年之久，周天籁对于时间的回忆与事实有一些出入。其实《亭子间嫂嫂》连载于1939年7月3日，而《亭子间嫂嫂》的预告则出现于7月2日。由此可以断定，徐大风去见周天籁的时间该是在1939年6月30日前后，“细雨”恰是江南六月间的“梅雨”，而不是“春雨”。在预告上，只有短短五十几字：“周天籁先生，文坛知名之士，著作甚富。今为本报撰《亭子间嫂嫂》文笔轻松，故事亦饶有兴味，笑料无穷，固一精心佳构，明日起连续在本报刊载，请读者诸君注意。”[31]与《啼笑因缘》诞生的过程相比，《亭子间嫂嫂》的出现仓促到令人难堪，不仅题目是在“胡乱拟了几个”之后不得通过而“随意”写出的，仅仅看到题目之后的“第二天本报主人就把它刊出预告来了”。对于这部描写社会底层私娼血泪命运的绍介，编者竟然说“笑料无穷”，凭此便足以看出《东方日报》编者此时对于《亭子间嫂嫂》内容的陌生。

在徐大风与周天籁约稿时，尽管周天籁“是研究儿童文艺的，可说社会小说没有把握”，连作者自己都担心写不好，徐大风仍“坐定不开船”，等到周天籁匆匆写出“亭子间嫂嫂”五个字时，徐大风马上“大为赞成，第二天本报主人就把它刊出预告来”，可见《东方日报》编者对于名家小说创作需求的心情之迫切，择选之草率。而严独鹤与张恨水约稿之时，张恨水已经凭借《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在北方读者中人尽皆知，并且严独鹤对张恨水连载于《小说霸王》上的作品，非常肯定，认为其描写深刻，读来让人觉得隽永有味。可以说，严独鹤选择张恨水为其创作是看中张恨水在大报副刊上已经取得的长篇连载小说尤其是社会言情小说的创作经验，而徐大风对于周天籁的选择则是一次具有冒险性质的“误打误撞”。

其次，小说写作与构思的顺序不同。张恨水在构思《啼笑因缘》之时，已经从创作《金粉世家》的过程中吸取了经验，也就是“先行布局”，这样，在连载之时，“无论如何跑野马，不出原定的范围”。在《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创作时由于“千头万绪”，需要“时时记挂着顾此失彼”，因此在创作《啼笑因缘》的时候，张恨水就故意“少用角儿登场”，但仍然“重于情节的变化”。[32]这些措施的采取标志着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张恨水已经开始走向成熟，《啼笑因缘》诞生之前作者便了然于胸，即使后面有特殊情况发生，也不会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发现与初衷南辕北辙。而“少用角儿登场”，恰恰是对中国传统章回小说叙述模式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小说将重心放在写“人”，这又与新文学对“人”的发现不谋而合，这决定了《啼笑因缘》从构思起便不会像传统章回小说那样枝枝蔓蔓，因为人物出场众多使得多数人物面目模糊。“重于情节的变化”则与梁启超所言“不得不于发端处，刻意求工”相映衬，是出于对报章连载小说特点的尊重和对日报读者阅读期待的尊重，更是对传统章回小说优点的继承与发扬。“少用角儿登场”和“重于情节的变化”恰恰展现了张恨水20世纪30年代对传统章回小说手法扬弃和继承的蜕变轨迹。这种小说处理模式决定了《啼笑因缘》最终一定会是一部相对完整的“单行本”，即便稍有“溜号”，也会很快回到原有故事情节的主线中来，不会信马由缰。

周天籁的《亭子间嫂嫂》却完全不是如此。尽管周天籁本人对于小说创作的规则有清醒的认识——“按理先有题材而后才有题目”，但是，迫于徐大风的“软硬兼施”，只得“勉力”为之。而这部小说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大受上海读者欢迎，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人物选择得好，顾秀珍是从农村来到城市迫于生活与社会压力的底层私娼。对于她的生活，“并不是人人都知道的”，人们有充足的好奇心和窥视欲。从“乡民”到“市民”的蜕变过程中的种种精神和心理体验，恰恰又可以唤起此时上海多数读者情感上的共鸣。主人公的“人极精彩”，又平添了人物自身的魅力。二是对人物原型非常熟悉——“同她做过有二年以上的邻舍，结果她是那样的惨死”，开始连载的过程中不需要费太多的心力。“偶一记忆”，人物“依然活跃在我眼帘之前”，所以作者对于人物的经历以及故事，只需要一一道来即可。所以，作者在同时有很多文债的情况下，认为这样 “二个月左右”的时间，应该是不成问题的。然而，在连载的过程中，“每次到理发店里剪发，到浴室里淴浴，在茶室里品茗，路上碰着了朋友，弄堂口坐一堆人吹风凉”[33]，人们都在谈论顾秀珍，于是，这样一来，本来预备四五万、两个月就结束的小说持续不断地写了两年，写到了七十万字，可是“本报主人说是还要往下写，一时万万不能放他断”[34]。于是在作家眼里，这样一部如此受人欢迎的小说就是“随随便便写成的狗屁文字”[35]。

再次，连载过程中报纸编辑对于两部作品倾注的关注程度不同。在连载过程中，《新闻报》为《啼笑因缘》做了大量的工作。不仅将读者的来信刊载在《本埠附刊》上，严谔声还故意买关子，“一个问题，越等待到长久，越觉得有趣味。凤喜姑娘问题，自未便贸然奉告。预知究竟如何，且看下文分解。”[36]还将读者宋冲的疑问和张恨水的回答以对话的形式全部发表出来，以引起读者注意[37]。但是最有代表性的事件莫过于1930年10月13日《本埠附刊》由编者发起的呼吁读者参与《啼笑因缘》结尾的猜测[38]。数据统计完后，为回应读者的热情，编者对读者的心理又做了一番剖析[39]。从这篇读者来信的统计结果便可以看出，猜测樊家树与何丽娜结婚的人数最多，沈凤喜、关秀姑、何丽娜三人的结局，沈凤喜最终因疯而死者最多，关秀姑流走江湖者最多，何丽娜另嫁他人者最多（这条是排除了何丽娜与樊家树结合情况以外的结果）。直到一个多月后，《啼笑因缘》大结局，恰是凤喜因疯而去了精神病医院，沈大娘说“这不就是送她进棺材吗？”与读者判断凤喜因疯而死非常相似，至于关秀姑和何丽娜的最终结局，也恰与意见最多的结局完全相似，这一切都用作者与读者意见的不谋而合来解释未免牵强。而编者对于读者阅读心理的分析，恰恰为《啼笑因缘》的结局提供了第一手的参考意见。这一调查活动，恰恰是大报副刊编者、读者共同参与的指向作品创作的有意识的运作行为，如果没有这次的调查，或许，故事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亭子间嫂嫂》则完全不是如此。在《东方日报》连载近两年的时间里，没有刊载任何关于《亭子间嫂嫂》的意见——无论是编者的意见还是读者的意见。尽管周天籁收到了大量读者的来信，但报社并无意参与这部小说的整体筹划以及开展小说与读者的互动。期间只有1941年3月30日和3月31日的两个预告，为《亭子间嫂嫂外传》即将连载予以宣传。此外即便略有文字提及，也与《亭子间嫂嫂》故事本身无关。读者一再来信，要求作者继续写下去，而至于该向何方写，报馆未提供任何帮助，难怪周天籁感觉“苦得要命”，仿佛舞台上演一出“独角戏”，如果接着演下去，“一定筋疲力尽而昏倒了”[40]。或许是由于《东方日报》编者人手有限，没有时间予以谋划，或者是由于版面原因，或者是由于报社编辑没有大报副刊那样的文学运作经验……总之，连载过程之中，《东方日报》的编者未能充分利用报纸这一媒介为《亭子间嫂嫂》在读者与作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尽管《亭子间嫂嫂》（加上《亭子间嫂嫂外传》）共连载了一年零十个月，比《啼笑因缘》连载时间长一年多[41]，但编辑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则要远逊于《新闻报》。

第四，二人作“续”的原因不同。就在休息的三个月里，周天籁几乎每天都能收到读者的一二封来信，有的读者疑惑这顾秀珍并无其人，有的说是确有其人；有的读者说不应该让她这样死得苦，有的还要作者宣布这家杀人不见血的产科医院，又有人要求再写一部新亭子间嫂嫂，有人到天韵楼去访问，还有人竟然找到会乐里喊顾秀珍出来开房间……这使得周天籁认为《亭子间嫂嫂》并没有给读者带来正面的影响，于是便“搜集了关于顾秀珍的起初从乡下——嘉兴到上海以及她堕落到卖淫的一大段经过”，是为了说明顾秀珍最终的悲惨结局，是与她来了城市之后爱慕虚荣、主观堕落不可分开的：

她做过不少的职业，都不能成就，没有一椿是称职的，于是任先生有一句话评定她：是一个天生吃生意饭的女子，她并不否认，足见她早已有下存心。想不到她走上这条路之后，生活竟然一天富丽一天，她现在根本不再想嫁人，不再找事做，她把这二个念头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时候可说是她黄金时代起端，也就是她堕落的开始，在她以为沾沾自喜，我却为了她不胜悲伤！[42]

周天籁要通过“续”来表达他对顾秀珍这个人物的爱憎，并借此警醒世人。这种处理，与张恨水对《啼笑因缘》的“续”完全不同，质量好坏且不论，至少《亭子间嫂嫂》的“续”是周天籁主观意愿的。而张恨水的《续啼笑因缘》则是在“不能续，不必续，也不敢续”[43]的主观愿望下，三年中迫于三友书社和读者的压力以及其他续作违背本意的“不得不续”，以致于张恨水后来回想起来，依旧认为还是“不续的好”，要表现抗日的话，“可以另外写一部书”[44]。这样两种不同的创作初衷和创作态度，必然导向不同的结果。

同是社会题材小说，同是在社会上产生的巨大“轰动”，一篇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初，一篇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末，时代背景的巨大差异及其对作家产生的不同影响，使得我们无意去评价这两个文本究竟哪一个文学价值更高，哪一个故事更好。但通过对两部小说在不同介质连载过程中以及结果种种差异的剖析，可以看出，相较于《亭子间嫂嫂》产生轰动的“出乎意料”，《啼笑因缘》因了《新闻报》从孕育到成长过程中的种种基于商业目的的运作行为，其轰动似乎更在掌控之中。而二位作家对两部作品的“续”的不同处理，又恰恰呈现了市场的双刃剑特质之于作家的种种可能。这使我们可以窥见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通俗文学市场化程度的日益加深，编辑和作者在载体、市场与小说连载形式之间，不断权衡、调适、实践，使现代通俗文学在“物质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之间不断往复并进而寻求突破的种种努力。

注 释：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插图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版，186页。

[2]同上，205页。

[3]解弢：《小说话》，中华书局民国八年（1919）版，116页。

[4]同上。

[5]在《新小说》第一号中，梁启超指出：小说“结构之难，有视寻常说部数倍者”。“名为小说，实则当以藏山之文、经世之笔行之。其难一也。”“新小说之意境，与旧小说之体裁，往往不能相容。其难二也。”“今依报章体例，月出一回，无从颠倒损益，艰于出色。其难三也。”“按月续出，虽一回不能苟简，稍有弱点，即全书皆为减色。其难四也。”“……不得不于发端处，刻意求工。其难五也。”

[6]梁启超：《<新小说>第一号》，载《新民丛报》第二十号（1902）。

[7]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35页。

[8]包天笑说，自20世纪初开始，“小说与报纸的销路大有关系，往往一种情节曲折，文笔优美的小说，可以抓住了报纸的读者。”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6月版，318页。

[9]《新闻报》、《申报》在20世纪30年代版面最多时可达三十几版。

[10]如以英寸记，《申报》宽二尺八寸、高一尺十一寸，《新闻报》宽二尺十寸，高一尺九寸半强，《时事新报》等宽二尺十寸，高一尺九寸半强，《晶报》宽一尺九寸半，高一尺三寸半，故西方人又称小报为“蚊子报”。(见丹翁：《报纸尺寸》，《晶报》1931年4月9日二版。)

[11]由于每天给不同的报刊写稿，而每天报纸或刊物只连载几百字，所以许多通俗文学作家都要同时为几家报刊写稿，对于一部作品的创作感受常常是片段化的，如1933年5月间，张恨水同时在《新晨报》上连载《水浒别传》，在《新闻报》连载《现代青年》，在《晶报》连载《锦片前程》，在《申报》上连载《东北四连长》（杨柳青青），在南京《新民报》上连载《旧时京华》，在《旅行杂志》上连载《秘密谷》。而张恨水本人在回忆录里也专列出一节称其为“忙的苦恼”。（根据刘少文：《大众媒体打造的神话——论张恨水的报人生活与报纸化文本》书末附表2《张恨水中长篇小说的初版刊载情况》整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

[12]李楠：《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9月，296－297页。

[13]为与小报连载小说相区别和比较，本概念特借用“未完成时态”，由其改用而来。

[14]周天籁：《一张小报出版的经验》，《上海生活》第4卷第2期，1940年2月。

[15]汪仲韦（徐耻痕整理）：《我与<新闻报>的关系》，《新闻研究资料：第12辑》，展望出版社，1982年，127－157页。

[16]《本报增加售价二分启事》，载《东方日报》1939年9月10日，二版。

[17]福开森：《新闻报之回顾与前途》，《新闻报馆三十周年纪念增刊册 一八九三—一九二三》，上海：新闻报馆，1923年版。

[18]陶菊隐：《我所了解的新闻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编辑室编：《新闻研究资料： 1辑》，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107页。

[19]《本报广告刊例》，《新闻报》1930年6月30日，四版。

[20]汪仲韦（徐耻痕整理）：《我与<新闻报>的关系》，《新闻研究资料：12辑》，展望出版社，1982年，133页。

[21]郑逸梅，徐卓呆编著：《上海旧话》，上海文化出版社1986年版，64－65页。

[22]《亭子间嫂嫂》在《东方日报》连载之时，由于深受读者喜爱，刊载三个月后，报纸发行量即由三千份增至二万几千份，以致周天籁要求结束时，报社老板邓荫先立即写信“坦白诉陈，报纸即赖该文支持。”见周天籁：《亭子间嫂嫂》，《逍遥逍遥集》，文汇出版社，2008年1月，125－126页。

[23]如《东方日报》1939年7月18日第二版一个版面上就连载了周天籁的《亭子间嫂嫂》、大雷的《乱世春秋》以及路中天的《风云龙虎》等小说。

[24]周天籁：《一张小报出版的经验》，《上海生活》第4卷第2期，1940年2月。

[25]郑逸梅：《书报话旧》，《郑逸梅选集》（第一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915页。

[26]同上。

[27]严独鹤：《十年中之感想》，载《新闻报馆三十周年纪念增刊册 一八九三—一九二三》，新闻报馆，1923年版。

[28]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见张占国、魏守忠编《张恨水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42－43页。

[29]独 鹤：《对阅者诸君的报告》，《新闻报》副刊《快活林》“谈话”栏，1930年3月16日，二十一版。

[30]周天籁：《亭子间嫂嫂外传（一） 关于写这篇外传的话》，《东方日报》1941年4月1日，二版。

[31]《长篇连载<亭子间嫂嫂>周天籁著》，见《东方日报》1939年7月2日，二版。

[32]张恨水：《我的小说过程》，《上海画报》1931年1月27日－2月12日。

[33]周天籁：《亭子间嫂嫂外传（一）关于写这篇外传的话》《东方日报》1941年4月1日，二版。

[34]周天籁：《亭子间嫂嫂外传（二） 关于写这篇外传的话（下）》，《东方日报》1941年4月2日，二版。

[35]周天籁：《亭子间嫂嫂外传（一）关于写这篇外传的话》《东方日报》1941年4月1日，二版。

[36]《凤喜姑娘怎样——夫妇间所见不同》，载1930年8月30日《新闻报》副刊《本埠附刊》，二十二版。

[37]见宋冲：《啼笑因缘几个疑问》，载1930年9月19日《新闻报》副刊《本埠附刊》，十八版；张恨水：《啼笑因缘几个疑问——敬答宋冲先生》，载1930年10月12日《新闻报》副刊《本埠附刊》，十七版。

[38]见小记者：《新闻报》副刊《本埠附刊》，1930年10月13日，十八版。

[39]见编者：《啼笑因缘结果猜测》，《新闻报》副刊《本埠附刊》，1930年10月21日，二十一版。

[40]周天籁：《亭子间嫂嫂外传（二） 关于写这篇外传的话（下）》，《东方日报》1941年4月2日，二版。

[41]《啼笑因缘》在《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从1930年3月17日开始连载，至1930年11月30日结束。

[42]周天籁：《亭子间嫂嫂外传（一五三）》，1941年8 月 31日，二版。

[43]张恨水：《作完《啼笑因缘》后的说话》，三友书社1931年2月第3版，181页。

[44]张恨水：《我的创作和生活》，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1版，256页。

**作者简介：石娟，女，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后。**